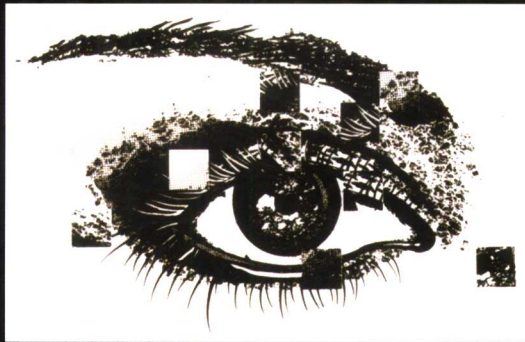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主编 田正平



朱宗顺 著

交流与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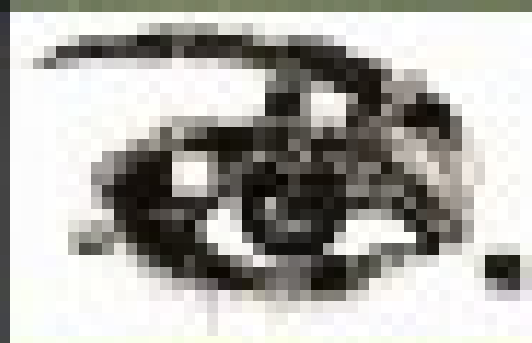
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1978—2000

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育交流与教育改革的国际视野

1998—2000



教育交流与

交流与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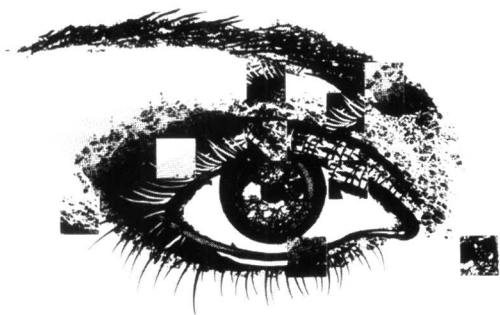
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1998—2000

教育交流与改革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主编 田正平



朱宗顺 著

交流与改革

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1978—2000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朱宗顺著.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12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ISBN 7-5338-6453-0

I. 交... II. 朱... III. 教育改革-研究-中国-1978—2000 IV. 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0539号

交流与改革

——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

朱宗顺 著

责任编辑 周俊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校对 雷坚
责任印务 温劲风

-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1000 1/16
- **印 张** 27.5 **插 页** 1
- **字 数** 423 000
-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 **印 次** 2006年12月第1次
- **印 数** 0 001-2 500
- **书 号** ISBN 7-5338-6453-0/G·6423
- **定 价** 40.00元
-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j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田正平简介

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81年于杭州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现任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高等教育史等。曾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及浙江省重点研究课题多项,成果有多项获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5年当选为首届浙江省特级专家。

朱宗顺简介

1989年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5年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4年于浙江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幼儿教师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主编《现代学校教育导论》,参编《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杨贤江全集》、《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家庭教育学基础》等。主持“近代学前及特殊教育理论的传入及影响”、“浙江省学前特殊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等课题,参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流动与求索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

借鉴与发展

——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

交流与改革

——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

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逐渐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热潮,这股热潮历经20多年而不衰,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说到底,这是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重新走向世界的现实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种反映。其中,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其内容广泛涉及有关留学生派遣的研究,外国来华专家学者的研究,国外教育理论、教育方法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教育文献资料流布的研究,中外官方与民间教育合作项目的研究,等等。我在90年代末曾做过一个十分粗略的统计,最近20年,仅中国大陆地区有关留学生问题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其数量就远远超过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有关留学生的论文到20世纪70年代末,整整80年的总量。而且研究的参与者远不止是教育史工作者,作者群广泛地分布在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对教育交流研究给予特别关注的学术现象,而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个人的看法,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实现教育现代化长远目标的需要。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尽快培养自己的人才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国家衰败是由于人才缺乏,而人才缺乏是由于教育不振。为了振兴教育、培养人才,近百年来,中国在教育上曾经全心全意地向日本学习,向美国学习,向欧洲学习,向苏联学习。这种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教育交流的过程;当然,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交流更多地以单方面的形式展开而不是对等的交流。主要形式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美国、欧洲和苏联;聘请日本、美国、欧洲、苏联的教习、专家来中国任教;借鉴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管理制度、教学制度;大

量翻译这些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等等。可以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或者称之为现代化)从19世纪60年代启动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外教育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换句话说,中外教育交流曾经是推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推动力。

那么,今天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要尽快改变自己经济上的落后地位,要增强国际竞争力,人才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向一切教育上先进的国家学习;换言之,尽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当然,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大潮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是,我们今天主动地走向世界。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所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政策中都体现了这一基本思路,中国的教育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步伐加快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使新形势下开展的教育交流少走弯路,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有必要对我们百年来在进行教育交流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我们学术研究者的责任。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与世界各国进行教育交流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也需要认真地予以总结。从历史的研究中为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说明,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自觉承担的责任。我想,这也是近20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外教育交流的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当代中国对外教育交流蓬勃开展的现实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与世界各国教育交流的步伐,而且这种交流几乎涉及各个层面。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教育交流可以分为“显性交流”和“隐性交流”两种类型。所谓“显性交流”,主要是指那些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人和物的交流,如留学生的派遣与接收、教育专家的交换与互派、教育制度的模仿与借鉴、先进教学设备的引进、图书情报的交流、教育资金的获取或赠予、教育项目的合作,等等。所谓“隐性交流”,主要是指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方面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吸收,这些方面只能感受和意会,可以说很难看得见、摸得着。“隐性交流”往往是依附于“显性交流”的人和物而实现的;当然也不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教育交

流,可以说是“显性”与“隐性”同时并举、全面展开。我想举三组简单的数据来说明:第一组数据是,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中国政府派遣教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副部长级以上的教育行政官员(包括副总理)出国进行教育访问考察者,超过70人次,平均每年有3至4位最高级别的教育行政官员率团到世界各国进行教育方面的考察学习,出访地区遍及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有大批外国教育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交流,据统计,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间,有930个外国教育代表团的近5000人次到中国进行教育方面的考察访问。第二组数据是,截至2003年底,中国先后有大约70万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留学国家和地区达120多个,可以说遍布于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外国来华留学生的人数,以每年近1万名的数量在增长。第三组数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开展的双边教育合作项目有数十个,包括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中加大学管理教育项目、中英技术合作项目、中日学者交换项目等;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有几十个教育方面的多边合作项目在进行。以上所举的是“显性交流”方面的一些数据和例子。从“隐性交流”角度讲,我只举一个例子,即教育学科最基本的教材——《教育学》教材的编写来说明这种交流影响的深入和广泛。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署名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组编写的《教育学》一书,全书共有注释61条,其中用领袖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下同)作注释的有47条,占全部注释条目的77%;用中国文献作注释的有7条,占11.5%;用国外文献作注释的有7条,占11.5%。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叶澜主编的《新教育学教程》一书,全书有注释227条,其中用领袖著作作注释的有41条,占全部注释条目的18.1%;用中国文献作注释的有60条,占26.4%;用国外文献作注释的有126条,占55.5%。两种教材,出版时间相隔仅12年,而引用文献中国外文献所占比例由11.5%上升至55.5%,这种国外文献引用率短期内的大幅度增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教育观念、教育思想领域通过交流所受到的影响的深度。

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前广泛、深入开展的中外教育交流的现实,如何在政府的政策层面和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更好地、或者说最大限度

地获取教育交流带来的正面成果,而相应地避免或尽量减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制定或调整对外教育交流政策,总是首先从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出发的,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更显得重要。比如说,20多年来,我国的留学生政策就曾发生过多次的修订、调整;比如说,我国对于引进外国专家学者的政策也曾发生过多次的变化;再比如说,我国对于外国团体或个人在华办学活动的政策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完善过程之中。所有这些政策的调整、实施和修订不仅受到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同时也需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的支持。这种现实的需要,同样成为推动教育交流研究的强大动力。我们已经注意到,近年来在教育交流领域涌现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研究总结和重新认识,也包括大量的对教育交流现实问题的研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再次,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逐步得到改善,许多过去曾经是学术禁区的领域已经或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就为教育交流的深入研究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条件和保障。比如说,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当作批判的对象,这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开始从宗教传播、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一在中国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教育现象,充分肯定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在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比如说,关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问题的研究,由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洋务运动领导人的地位和作用在最近20年的史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本身也是学术环境宽松的结果),这也就使得对由他们倡导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运动的评价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再比如说,现在我们对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苏教育交流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可以用更理智、更科学的态度进行回顾和反省,等等。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对于繁荣学术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近年来教育交流研究的备受关注与大环境的改善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上三个方面——实现教育现代化长远目标的需要、当代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推动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我认为是促成近 20 年来教育交流研究形成热潮并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辑入“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的三种著作，正是试图从不同角度探讨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的专题研究成果。丛书包括：《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和《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其中，《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是以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流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学术著作。教育交流既包括与世界各国之间开展的交流，也涵盖国内不同发展条件下各地区之间的交流，而无论是国际交流还是国内交流，教师的交流（或称作流动）都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频繁的流动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频繁流动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全书选取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为研究对象，从自由流动与压力流动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流动实况。应该说，无论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而言，抑或是教育交流史而言这都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是系统研究 1949 年至 1976 年间中国与苏联教育关系的学术著作。众所周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6 年的近 30 年间，苏联教育对中国教育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书把这种影响放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大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世界教育交流视野中对中苏教育交流的成败得失作出自己的分析评价。书中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全面展现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教育交流方面曲折而极富启迪意义的经验教训。《交流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1978—2000》是关于当代中外教育交流的专题研究。全书从教育交流的视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中外来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与探讨。书中应用文本解读、个案解剖、定量分析等方法，审视、考察了 1978 年至 2000 年间我国教育改革的历程，力求对教育交流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各个层面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这些作用和影响的程度，作出自己的判断与评价。当然，由于上述三个专题相对而言国内外可资参考的成果都比较少，从一定意义上讲，都可以说是一种开拓

性的尝试,所以各个专题的分析框架是否合理、研究的切入点是否准确、得出的结论是否科学以及史料的掌握是否全面等,这一切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学术界的批评指正。

浙江教育出版社在得知了我们的研究情况之后,慨然应允将三种成果结集出版,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田正平

丙戌早春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目 录

总 序	田正平
导 论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	1
第二节 概念约定	2
第三节 研究文献回顾	10

第一编 中国当代教育交流概况

第一章 全方位教育交流政策的确立	21
第一节 全方位教育交流政策的初步形成	21
第二节 教育交流政策的进一步拓展	33
第二章 新时期研究、介绍国外教育高潮的逐步形成	43
第一节 研究、介绍国外教育高潮的兴起	43
第二节 新时期研究、介绍国外教育高潮的特点	62
第三章 推动教育交流的原因分析	82
第一节 教育交流发展的内因分析	82
第二节 教育交流发展的外因分析	97

第二编 教育交流与教育理论的构建

第四章 教育交流与《教育学》教材	
——对《教育学》教材的注释和行文的考察(上)	107

第一节	途径之一：从教材的注释看教育交流的影响	108
第二节	途径之二：从教材对国外教育家言论的引用看 教育交流的影响	119
第五章	教育交流与《教育学》教材 ——对《教育学》教材中基本概念演变的考察(下)	128
第一节	“教育起源”概念的演变与教育交流	128
第二节	“教育本质”概念的演变与教育交流	137
第三节	“教育目的”概念的演变与教育交流	151
第四节	“课程”概念的演变与教育交流	159
第六章	教育交流与教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172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173
第二节	教育交流对教育学研究领域拓展的影响	183
 第三编 教育交流与当代教育改革 		
第七章	全球视野下的教育观念变革	205
第一节	终身教育观念的传入及影响	205
第二节	全民教育观念的确立	223
第八章	教育交流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	241
第一节	教育交流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241
第二节	教育交流与教育结构的调整	263
第三节	教育交流与办学体制的改革	280
第九章	教育交流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大众化	294
第一节	教育交流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294
第二节	教育交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313

第十章 教育交流与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普及义务教育	331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普及义务教育的进展	331
第二节 教育交流与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推进	340
第十一章 教育交流与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变革	358
第一节 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358
第二节 教育交流对课程改革的影响	366
第三节 从外国教材的引进看教育交流对教材改革的 影响	378
第四节 教育交流对教学方法改革的影响	386
结 语	402
第一节 教育交流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402
第二节 教育交流需要开放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405
第三节 教育交流既要重视有形资源更要关注无形资源 ...	407
第四节 教育交流中要注意处理好引进、借鉴和创新的 关系	409
主要参考文献	412
后 记	428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

20 世纪已在全球的欢呼声中走进了历史,以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为特征,这个世纪历经了迄今为止最为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无数坎坷和波折,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踏上了正轨,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时代。1978 年至 2000 年的二十多年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的教育改革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2000 年,全国 85% 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迈向了大众化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教育体制已具雏形,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体系初步形成,分支齐全的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建立。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创立启动教育现代化进程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波折与延误,在 20 世纪珠落帘卷之际,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终于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

回顾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的历程,这样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怀:我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始于晚清,何以直到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才能取得长足进展?换句话说,中国当代教育改革成就的取得何以可能?毫无疑问,影响教育改革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环境来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是教育改革的内因所在。改革开放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持,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创的教育却无法满足这一变革的要求,为适应国内社会变革的需要,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可见,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从外部因素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教育改革此起彼伏,各种教育理论纷纷兴起,但由于政治的原因,在 1949 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同世界教育发展的大势隔膜日深。1978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的格局形成,国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经验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等,纷纷被引进国内,对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

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学者所言：“当代的中外教育交流，已成为考察与研究中国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视点。”^①可以肯定，在影响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众多要素中，对外教育交流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抽象地肯定教育交流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影响，不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是其影响的具体表现却很难说已经清楚、明晰了。相对于抽象肯定对外教育交流的作用而言，有关教育交流影响的具体形式、内容、范围与程度等细节，还是一个“黑箱”、一幅想象的幻影，不甚了了。因此，对这一问题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概念约定

一、教育交流、教育改革的界定

(一)教育交流的界定

厘清概念是开展学术研究、思想交流的前提。“教育交流”一词在教育学科的话语体系中，几乎是一个新面孔，综观已出版的权威的教育大辞典、教育百科全书，均没有“教育交流”的身影。比如，由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以及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胡森(Torsten Husen)教授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都没有列出“教育交流”的词条。语言词汇、学术概念本是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反映，“教育交流”之不能入典，既反映出先前教育交流实践存在局限，也衬映出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忽视。鉴于“教育交流”的概念缺乏权威解释，本书为言说方便起见，不得不预为约定。

在汉语里面，“交流”含有传播、交换之意^②，彼此将自己的所有提供给对方是为交流^③。由于交流是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一种互通所有的活动，

①丁钢著：《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②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第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0页。